

台灣同志運動的機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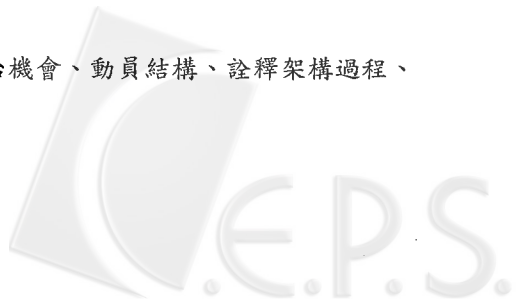
以同志諮詢熱線為例

賴鈺麟（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台灣同志運動近年來出現兩個新發展，也就是「機構化」與「體制化」。本文針對同志諮詢熱線進行個案研究，以更清楚地認識這些新發展。首先，修改McAdam等學者研究社運的分析架構，進而提出研究同運的分析架構，並運用它來討論熱線的運作與發展。其次，針對以下幾個議題進行討論。就政治機會而言，政府對於同志權益的侵害與相關政策的推動，以及選舉制度所提供的對話機會，對於熱線所產生的機會與限制。就動員結構而言，影響個人參與熱線並持續擔任義工的因素，還有熱線運用哪些社會網絡與組織架構進行動員與運作，以及熱線經費來源多元化的原因。就詮釋架構過程而言，熱線與哪些對象進行論辯，以及熱線的媒體策略和與大眾媒體的關係。就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的關係，資本主義發展和都市化程度提高、以及台灣傳統文化和文化全球化等，這些現象與同運和熱線的關係。就與其他社運團體的關係而言，分析熱線與其他社運團體之間，相互學習、合作、影響、資源共享、競爭、對抗等關係。最後，本文歸納這五組因素之間的關係，並提出對於熱線運作與發展的建議。

關鍵詞：同志運動、機構化、政治機會、動員結構、詮釋架構過程、經濟／社會／文化變遷。

收稿日期：92.3.4；定稿日期：92.5.12



一、前言

隨著台灣近幾年 IRC、BBS、WWW 等網路科技的發展，提供同志一個安全便利的管道彼此互動，使得參與同志社群的成員急遽增加，進而影響這些人同志認同之建構與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九十年代末期台灣同志運動（簡稱同運）開始進入「機構化」與「體制化」的階段。所謂的機構化是指同運團體轉型為登記有案的非營利組織（顧忠華，2003），而體制化則是指國家對於同運所作的體制性與政策性回應（汪明輝，2003）。首先，同運團體正式立案並擁有專職工作人員，使得同運參與者的集結，不會因為某些事件的落幕而解散，進而可以持續推動相關工作。其次，公部門開始正面回應同運訴求，這包括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編列預算舉辦「台北同玩節」（簡稱同玩節），以及法務部與教育部分別制定法律草案保障同志權益等。為了更清楚認識台灣同運這些新發展，筆者選擇對同志諮詢熱線（簡稱熱線）進行個案研究。

熱線是台灣目前唯一全國性立案同志團體，也是第一個由同志本身組成，兼具社會服務與社會運動的正式機構，主要工作項目包括電話諮詢服務、同志平權運動、認識同志教育計劃、愛滋防治計劃等。之所以選擇熱線，因為它是台灣第一個機構化與體制化的同志團體，

致謝辭：這篇論文係改寫筆者碩士論文「台灣同志運動與同志諮詢熱線之研究」第三章，指導教授畢恆達老師與石之瑜老師的不吝指導，以及口試委員范雲老師、朱偉誠老師與王雅各老師的細心建議，都使我永難忘懷。同時，衷心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題主編朱偉誠老師、Petrus Liu 與熱線社工主任鄭智偉的寶貴意見。以上這些人都讓我獲益良多。此外，特別感謝助理編輯蘇秋華小姐於這段期間所提供的協助。最後，謹以此文獻給在同運與社運共同奮鬥的夥伴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也是目前機構化與體制化程度最高的同志團體，使得它在台灣同運發展中，扮演一個相當關鍵的角色。本文的研究動機有三點：（一）透過研究熱線以了解台灣同運的「機構化」與「體制化」。（二）台灣同志研究目前比較缺少運用社運理論從事研究，透過本文將社運理論帶入台灣同志研究。（三）台灣社運研究目前相對漠視同運發展，藉由運用社運理論研究同運，希望促進兩者之間的對話與了解。

二、文獻回顧

McAdam 等學者認為，來自不同國家與代表不同理論傳統的學者，在分析社運的出現與發展時，往往會強調三組因素的重要性。這三組因素分別是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ies)、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s)、以及詮釋架構過程(framing processes) (McAdam, McCarthy, & Zald, 1996)。政治機會主要探討的是，政治系統對於社運所產生的機會與限制，以及社運對於政治系統的影響。這組因素有四個面向：（一）制度化政治系統的相對開放或封閉。（二）通常作為政體基礎的菁英聯盟之穩定性或不穩定性。（三）菁英盟友的出現或缺乏。四、政府鎮壓的能力與傾向 (McAdam, 1996)。動員結構主要探討的是，社運所採取集體行動的形式，也就是戰術戲碼 (tactical repertoires)，以及藉以動員的各種組織與關係。這些動員的組織與關係，可以用組織正式化與集中化，以及是否主要獻身於改變社會的目標，來加以區分 (McCarthy, 1996)。此外，MaCarthy 那篇文章所忽略的，影響個人投身社運組織與持續參與社運的因素，也是屬於動員結構的重要議題。詮釋架構過程主要探討的是，運動者如何策略性生產，對於這個世界和對他們自己的認識，進而合法化並促進社運。這

組因素有六個面向：（一）爭論與詮釋架構之戲碼的文化建構。（二）文化衝突與歷史事件對於提供機會從事詮釋架構的貢獻。（三）詮釋架構過程作為一個策略性行為。（四）競爭過程呈現詮釋架構於其中被選擇與形成優勢的環境。（五）詮釋架構透過大眾媒體被傳遞與再建構。（六）政治機會與動員交互塑造詮釋架構競爭的結果（Zald, 1996）。經過筆者檢討近年來同運相關研究，發覺上述這個分析架構並不足以涵蓋同運的豐富樣貌，因此嘗試針對原有架構進行修正，也就是增加經濟／社會／文化變遷與其他社運的關係這兩個因素，提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分析架構（賴鈺麟，2000）。經濟／社會／文化變遷主要探討的是，資本主義發展、都市化程度提高、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等結構變遷，與同運之間的複雜關係。與其他社運的關係主要探討的是，同運與其他社運（包括反同運組織）之間，相互學習、合作、資源共享、影響、競爭、對抗等互動關係。

三、熱線與政治機會的關係

討論熱線與政治機會的關係，將集中於下列幾項因素：選舉制度使得政治系統提供同運相對開放的機會，還有政黨輪替造成同運的菁英盟友出現，以及與政府鎮壓的能力與傾向相關但不同的，政府對於同志權益的侵害，刺激同運的動員與回應。至於政治系統成為熱線資源提供者的部分，將留到第四節再討論。

政府對於人民權益的侵害，突然強加於人民身上痛苦，並且引發文化衝突，經常提供社運動員機會，這裡的文化衝突是指「當兩個或更多潛在衝突的文化主題，被事件的力量引發實際的衝突，或是當行為的現實被視為與這個運動的意識形態正當性具有相當大的差異。」

(Zald, 1996) 政府對於同志權益的侵害，包括台北市警局對於同志商業機構的不當臨檢、國防部禁止同志擔任憲兵、以及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稱疾管局）發布新聞稿污名化男同志社群等，就是屬於這類事件。它們所引發的文化衝突是指，一方面政府被認為應對所有國民一視同仁，這也是它的意識形態正當性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實際作為卻歧視甚至迫害同志，這類事件更將平日潛藏或意義含糊的異性戀霸權，以戲劇化方式加以彰顯。

以下將以警察的不當臨檢為例，作更詳細的說明。

警察對於同志商業機構的不當臨檢，受到以下四個因素的影響：

（一）警察風紀問題（向業者索取保護費）。（二）法律對於警察臨檢權力規範模糊。（三）政府管制八大行業過嚴。（四）同志因為擔心曝光，以致不敢伸張自身權益。熱線針對此類事件，採取前往現場聲援業者與消費者、與其他同志團體聯合發表聲明、舉辦或參與座談會暨記者會、以公文向政府陳情等方式加以回應。例如，針對「AG 事件」是採取體制外抗爭的方式，而針對「二十四會館事件」則是運用體制內陳情的方式。¹ 後來可以採取體制內的方式，是因為熱線於民國八十九年正式立案，可以運用公文陳情的方式，直接向政府相關單位表達意見。此外，熱線因為與其他同志團體籌辦兩屆「台北同玩節」，而和民政局長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可以透過他向警察局長遊說。同時，熱線開始接觸某些友善市議員，可以透過合辦座談會或議會質詢等方式施壓。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熱線逐漸從體制外的團體，轉變成體制內外兼具的團體，同時也反映熱線因為「機構化」與

1 「AG 事件」是指民國八十七年警察對於 AG 同志健身房不當臨檢，並且強迫顧客擺出猥褻動作以拍照存證。「二十四會館事件」是指民國九十年同志三溫暖二十四會館遭受警察連續臨檢二十多次，而且警察暗示將持續臨檢至該場所歇業為止。

「體制化」，而擁有更多的戰術戲碼。值得注意的是，體制內的方式不一定比較有效，當此方式成效不彰時，熱線還是會採取體制外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政府於法律、政策、預算等層面，漠視同志的需求與權益之情形，近幾年來開始出現轉變，進而改善熱線所面臨的政治機會，包括中央政府的人權政策、愛滋防治政策、教育政策，以及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文化局相關預算的編列等。產生轉變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選舉結果造成政黨輪替，使得新的菁英盟友出現，或是舊的菁英盟友更接近權力核心。例如，中央政府人權政策的轉變，主要是因為民國八十九年陳水扁當選總統，使得同運舊的菁英盟友，也就是邱晃權與黃文雄，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成員；而同玩節預算的編列，主要是因為民國八十七年馬英九當選台北市市長，使得同運新的菁英盟友，也就是民政局長林正修出現。當然，民國八十七年同志團體組成「1998 選舉同志人權聯盟」（簡稱人權聯盟），對於兩位候選人陳水扁與馬英九針對同志權益的態度，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雖然菁英盟友出現改善熱線所面臨的政治機會，卻仍舊是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援引 Constain 與 Majstorovic 對於美國女權立法的研究，來分析台灣同運時發現，同運透過新聞媒體的中介與再現，改變民意進而影響政府立法，或是改變政府立法進而影響民意。但是，台灣同運現階段受限於本身所擁有的政治實力有限，部分新聞媒體對於同志的污名化，以及多數的民眾與政治系統成員，將所有公民視為異性戀者的預設，並且反對賦予同志實質平等權利等情況，使得政治機會對於同運的開放，仍舊是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Constain & Majstorovic, 1994）。以下將以人權政策為例，做更詳細的說明。

新政府上台以來對於同運訴求逐漸開放，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人

權政策。舉例來說，民國九十年法務部公布「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其中第二十四條規定「國家應尊重同性戀者之權益，同性男女得依法組成家庭及收養子女。」民國八十九年陳水扁總統接見美國與台灣同運代表時，同意同運代表所提出的訴求；民國九十一年行政院所提出的「人權白皮書」，其中「性別認同的人權」專門討論同志與變性人人權；民國九十年行政院聘請熱線常務理事喀飛，擔任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的諮詢委員等。然而不論是法務部、行政院或陳總統，之後都沒有任何具體行動加以落實，而推動小組成立至今也還沒召開會議。此外，草案內容反映政府對於同志人權的認識，只侷限於組成家庭及收養子女的部分，對於更基本的人權，如人身安全、財產權、受教育權、工作權、不被歧視對待的權利等則隻字未提（王蕓，2002）。同時，也反映出台灣同志人權法制化的進程，相較於其他國家有很大差異。Waldijk 的研究發現，歐洲各國同志人權法制化的進程，是由同性性行為除罪化開始，接著是制定法律禁止性傾向歧視，進而才承認同志伴侶的法律關係（Waaljik, 2000）。反觀台灣同志人權法制化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同志伴侶的法律關係。法制化進程的差異原因，包括台灣因為主要宗教教義的不同，法律自始就沒有懲罰同性性行為，所以根本不需要將同性性行為除罪化。此外，法律對於人民各項權利的保障相當薄弱，人民對於平等權與反歧視的概念也才開始覺醒，更不用說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草案內容使得熱線在沒有仔細討論其他更基本同志人權的情況下，提早將組成家庭與領養子女的權利放入台灣同運的議程當中。

選舉制度提供社運接近政治系統的機會。研究者早已將政黨是否支持抗爭運動的傾向，扣連到選戰的不穩定性，而能否藉以贏得新的選票，則是其中的首要考量（Della Porta & Diani, 1999）。熱線利用

各項選舉所提供的機會，藉由和其他同志團體組成選舉觀察團，或是協助候選人提出同志政見等途徑，與各候選人針對同志政策進行直接對話，試圖增加其對同運訴求的接受程度。歷屆選舉觀察團的訴求，奠基於「同志人權」與「同志選票」兩個觀念。同志選票是指同志選民不但存在，而且數量占一定比例，在競爭激烈的選舉中，更可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此外，候選人可以提出同志政見，來爭取同志選票。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同志選票在台灣尚待成形，在美國卻已是不容忽視的現象（Hertzog, 1996）。有關熱線於「2001 立委選舉同志觀察團」（簡稱同志觀察團）中，所提出「同志公民權」的概念，將留到第五節再討論；而熱線於兩次選舉觀察團中，與其他同志團體的合作關係，將留到第六節再討論。

台灣同志團體針對各項選舉，提出政策訴求尋求候選人支持，已經累積很多經驗。筆者將以熱線直接參與的「1998 選舉同志人權聯盟」（簡稱人權聯盟）為例，進行更詳細的說明。政治菁英面臨競爭程度的增加，會造成同運政治機會的改善，因此有鑒於民國八十七年台北市長選舉競爭非常激烈，同志團體認為同志選票可以扮演關鍵少數的地位，遂組成人權聯盟提出政見訴求，也得到兩位候選人的正面回應。候選人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之後，台北市民政局從民國八十九年開始，每年以「同志公民運動」為科目名稱編列預算，成為全國各級政府中，唯一以同志議題作為預算編列的科目；而且他數次於公開發言時支持同志權益，以及親自出席同玩節以表達支持，並且針對同志團體陳情侵權事件加以處理等。此外，候選人陳水扁日後當選總統，除了接見台灣與美國同志運動代表，對於台灣同運代表所提出的訴求，口頭表示十分同意之外，並且針對法務部所提出的「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中，保障同志人權的部分，特別表達讚許之意。這兩個

人對於同志權益所表現的善意，某種程度是受到人權聯盟的影響。

不過，就選舉觀察團而言，所面臨的最大限制在於，候選人不會主動提出同志政見，以及同志選民於投票時，不會將同志權益列入考量。從同志觀察團的經驗可以發現，台北縣市同志社群的同志認同已逐漸成形，但是同志認同的政治化，進而將候選人的同志政見（利益考量）或同志身分（認同考量），納入投票決策之中，也就是形成所謂「同志選票」，還需要某些政治意識覺醒的教育工作。如何針對同志社群進行相關教育工作，以形成同志選票，在競爭激烈的選舉中扮演關鍵少數的角色，進而讓候選人願意主動提出同志政見，以及選舉觀察團於候選人當選之後，可以持續扮演有效監督的角色，則是熱線與台灣同運日後應該努力的方向。

四、熱線與動員結構的關係

針對熱線與動員結構的關係，主要探討的是熱線如何取得組織運作所需的資源，以及如何運用資源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與經費兩種資源。熱線的人力來源主要分成三種：義工、實習生與工作人員。而熱線的經費來源主要也分成三種：向同志社群募款、向政府部門申請經費、向聯合勸募申請經費。

個人因為許多動機而參與義工團體，與熱線特別相關的是「認同」這個動機。Simon 等人的研究發現，如果同志對於同志社群的認同程度越高，進而對於同運的認同程度越高，最後導致參與同運的意願越高（Simon, et al., 1998）。此外，如果對於接受服務的人認同程度越高，就會對其同理心越高，進而越有意願擔任義工（Simon, Sturmer & Steffens, 2000）。必須注意的是，義工的認同並不是靜止的，參與

熱線的經歷會改變其認同，而且對於有些義工而言，已經擁有很強的認同並不是參與熱線的動機，而是想要建立正面的認同，甚至解決自身的認同問題，才是其參與熱線的動機。至於個人是否持續擔任義工，最主要受到「自利」這個因素的影響。Simon 等人的研究發現，義工對於其工作成本效益的評估，如果認為工作是有益的，越有意願繼續擔任義工（Simon, et al., 2000）。此外，國外相關研究發現，參與愛滋病義工團體的動機有以下幾類：對於社群的關切、實踐個人的價值、多了解愛滋病議題、個人發展（包含建立社會網路）、增強自我尊嚴等；其中義工多了解愛滋病議題、個人發展、增強自我尊嚴等自利導向動機的滿足，與擔任義工時間長度呈正相關（Omoto & Snyder, 1993, 1995）。²

首先，熱線與其他義工組織很大的不同在於，它是一個同志團體。因此，很多人願意加入它並持續擔任義工，最主要動機是認識其他同志朋友與建立自我同志認同。換句話說，對於這些人而言，進入熱線與其說是擔任義工，倒不如說是參加同志團體，經由建立社會網路與增強自我尊嚴，在她們生命中產生許多正面影響。建立同志認同之後，會增加對於接受服務之人的同理心（而且很多義工原先也是接受服務的人，本身已經具有很強的同理心），因此越有意願持續擔任義工。不過，這個因素對於每個義工具有不同重要性，假設對於某個人而言，她加入熱線之前已建立好同志認同，並且也有許多同志朋友，這個因素對她而言就不是那麼重要。其次，資深義工相較於一般

2 Ramirez-Valles 與 Brown 認為社會對於同志的研究污名，導致有些同志不願暴露自己的性傾向，甚至具有「內化同性戀恐懼症」（internalized homophobia），都會限制她們擔任義工的意願（Ramirez-Valles & Brown, 2003）。這個因素是否對於熱線招募義工造成影響，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

義工具有幾點特質，可以運用成本效益的觀點進行說明。從效益角度而言，資深義工通常從工作經驗中得到更多回饋，包括情感、能力、自尊心的回饋等；從成本角度而言，資深義工通常個人狀況比較穩定，不會因為感情、工作、情緒等因素的變動，增加其擔任義工的成本，進而影響其持續投入的意願。

熱線的經費來源與組織運作，所經歷的最大轉變是機構化。熱線之所以選擇機構化，是因為它提供許多制度性誘因，包括經費來源的多元化，與獲得「所謂的」正當性。不過，當初因為擴充經費來源所選擇的機構化，日後也不可避免地影響組織運作。³ 熱線剛開始時經費絕大部分來自同志社群，主要運用以下三種方式：徵求年度認養人、郵政劃撥帳號與銀行帳號接受捐款、舉辦年度募款晚會。首先，因為年度認養人主要透過義工的人際網路去徵求，所以數量與金額會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年度募款晚會是每年熱線籌畫最久、耗費人力最多的活動，每次都會提出一個主要訴求進行募款。不過，隨著熱線經費來源多元化之後，募款晚會所具有的意義開始轉變，也就是維持熱線自籌財源的能力，而不完全倚靠政府與聯合勸募的補助，以及維持與同志社群之間的連結。此外，募款晚會提供大多數義工共同籌畫活動的機會，使得義工有參與熱線和情感連結的感覺，而募款晚會也逐漸成為同志社群的年度盛事之一。不過，僅向同志社群募款不但所能募到金額有限，而且每年募款晚會都必須承受很大壓力。因此，熱線選擇機構化使得經費來源多元化，政府與聯合勸募開始成為熱線重要經費來源。就政府作為經費來源而言，它願意提供經費給熱線，反

3 與其他社運團體不同的是，熱線在考慮是否機構化時，所面臨的最大考量是現身議題，例如機構化之後發言人是否在媒體現身，以及協會辦公室地址是否公開。

映出經由先前同運努力，所造成政治系統的開放。此外，因為熱線是唯一全國性立案同志團體，某些同志團體會採取與熱線合作的形式，運用熱線名義向政府申請經費。就聯勸作為經費來源而言，人事費補助使得熱線有能力聘僱專職社工員，對於它作為社福機構而言是很重要的。此外，聯勸的審查、督導與查核，幫助熱線運作更制度化，與得到外界的監督與建議。不過，隨著近年來台灣經濟不景氣，政府相關補助經費減少，與聯合勸募可能停止補助等情形，都將帶給熱線很大衝擊。除了被迫暫時減少一名工作人員，還必須嘗試更多樣化的募款方式（例如跳蚤市場與收費活動等）。

機構化對於熱線的組織運作也造成很大影響。它原本是一個義工組織，理論上每個人都是地位平等，因此當初最高決策機制「委員會」，是每個有興趣的義工都可以參加的。但是，自從成立協會之後，義工之間就開始區分為理事長、秘書長與一般義工的不同，同時出現專職工作人員與義工的不同。理事長具有民意基礎，而專職工作人員對於熱線事務的投入又比義工多，使得它原有的決策模式開始轉變。許多事務的討論逐漸只侷限於理事長、專職工作人員、與某些重要義工（例如常務理事、各組組長）之間，使得一般義工無法參與討論，造成事務推動逐漸以這些人為主。不過，積極主動的義工還是可以藉由投身工作與擔任幹部，而參與熱線的決策過程。

五、熱線與詮釋架構過程的關係

熱線如何策略性生產對於同志議題的論述，以合法化並促進同運。在詮釋架構過程中，誰是熱線所要論辯的對象，誰是熱線所要影響的對象，論辯的內容是什麼，論辯與影響是透過什麼途徑來達成，

熱線論述時所面臨的限制又是什麼，這些議題是討論熱線與詮釋架構過程的關係時所要分析的。熱線論述時所要論辯的對象，具體例子包括新聞媒體、政府、主流輔導論述等，抽象例子就是社會對於同志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熱線與其他論述者的論辯，最主要是針對「同志是什麼」來進行，所以對於這個議題的認識，會隨著論辯進行而持續產生變化。因此，「同志」的意義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同運者也在論辯過程中，不斷改造自己的身分認同。

熱線與新聞媒體的論辯，主要係針對某些同志新聞的處理方式、價值判斷、影響等，也就是要消除對於同志的污名化（喀飛，2002）。熱線主要運用接受採訪、發新聞稿、辦記者會、投稿民意論壇等策略，與新聞媒體進行論辯。以下將以民國八十七年「同志墜樓死亡」事件報導為例，做更詳細的說明。該事件經由事發當天聯合晚報頭版頭條披露後，引起各大媒體一陣報導熱潮，熱線於兩天後發布新聞稿加以回應。運用 Snow 與 Benford 所提出之詮釋架構，來分析熱線新聞稿的內容，發現它包括詮釋架構的三個基本元素，也就是「診斷」（事件成因並不是當事人的性傾向，而是缺乏健全性／別教育，與青少年同志支援系統）、「預斷」（prognostic framing）（針對診斷發展出解決問題的策略，也就是提供健全性／別教育，與青少年同志支援系統）、與「動機」（間接鼓勵相關人士針對預斷採取行動）（Snow & Benford, 1988 as cited in Benford & Snow, 2000）。

熱線與政府的論辯，主要係針對政府某些活動、草案、新聞稿、政策等。以下將以民國九十年疾管局新聞稿「台灣男性愛滋感染者性取向與性活動之場所」為例，來做更詳細的說明。國外研究發現，媒體經常將政府官員設定成愛滋病議題的專家，往往將他們的發言直接引用，而不加任何質疑，使得同性戀恐懼症制度化（Myrick, 1998）。

此外，新聞稿內容暗示男同志因性伴侶人數較多而較易感染愛滋病，以及男同志三溫暖已成為愛滋病的溫床，除了將（男）同志認同醫療化之外（Epstein, 1998），並將男同志建構成「有罪的」感染者（Donovan, 1997），藉以規避政府施政缺失的責任。熱線於是與其他團體召開記者會加以回應，指出疾管局錯誤愛滋防治政策的嚴重影響包括：（一）污名造成愛滋病的「地下化」，進而阻礙防治工作。（二）草率公布檢驗者填寫的資料，破壞檢驗者對於檢驗單位的信任。（三）誤導社會讓它忽視「安全性行為」觀念的重要性。最後嚴正呼籲疾管局，不要再以「恐嚇」、「污名」、「道德化」的防治政策，污名同志社群，誤導社會大眾。這個記者會的直接影響是，疾管局日後所發布有關愛滋病的新聞稿，不再出現明顯污名化男同志的內容；間接影響則是，促進政府愛滋防治政策對於熱線訴求的開放（賴鈺麟，2002）。

熱線與主流輔導論述的論辯，主要係針對它輔導同志學生的觀點。熱線從事教育工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教師對於同志學生給予尊重與支持。可是，熱線認為主流輔導論述往往誤導教師，使她們做出傷害同志學生的行為，因此針對它提出批評與建議，包括對於同性戀的界定、同性戀成因、同性戀者認同發展模式、同志青少年常見的困擾等議題。舉例來說，熱線認為大多數主流輔導論述都在探討同性戀成因，卻從來沒有探討過異性戀成因，其實是因為認定同性戀是不正常的，進而研究成因想要加以預防與治療的心態。不過，這些看法對於主流輔導論述影響有限，反映出熱線進行論述時所面臨的困難，也就是它雖然擁有許多實務經驗，但是卻缺乏學術專業權威，會影響人們對於它論述的信任與接受度。

熱線論述有時並沒有具體論辯對象，這時可以視為是與社會偏見

和刻板印象進行論辯。以下將以同志觀察團為例，做更詳細的說明。同志觀察團本身具有很重要的論述意義，也就是提出「同志公民權」的概念，使得大家對於同志有新的認識。它在給立委候選人公開信裡指出：「同志是公民，是國家的主人，有權參與公共政策的決定，政府也應主動回應其所提出的訴求」（2001 立委選舉同志觀察團，2001）。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以往歷屆同志選舉觀察團，本次訴求係運用公民權，而非如以往運用人權作為詮釋架構。筆者認為公民權相較於人權，至少有兩個重要的不同：強調被其他公民承認，包括承認其與眾不同的差異（也就是性傾向），以及強調參與公共事務的協商與決策（Phelan, 2001）。⁴ 反觀以往訴諸於同志也是人，因此同樣具有人權，以及同志人權遭受侵犯的不合理。例如，人權聯盟於「台北彩虹新世紀——台北市同志族群的願景」裡指出：「讓同志們在台北市快樂飛舞，無所恐懼，自在地行走於屬於自己的城市之中，享有屬於自己的社區與空間，不會無端被歧視、騷擾甚至打壓」（1998 選舉同志人權聯盟，1998）。換句話說，以往所呈現的同志形象是相同與受害客體，現今所呈現的同志形象是差異與協商主體；詮釋架構轉變顯示對以往架構的反省之外，更受到英語系學術界對於「性公民權」（sexual citizenship）這個概念的討論。

從以上討論也可知，熱線與新聞媒體、政府、主流輔導論述、社會偏見和刻板印象的論辯，主要是透過新聞媒體的中介，而且熱線想要影響社會大眾，也必須透過它傳播。因此，談到熱線與詮釋架構過

4 值得注意的是，Phelan 她進一步指出怪胎化公民權必須包括陽具公民資格（phallic citizenship）與親屬關係異性戀公式化的終結。陽具公民資格是指視獨立的、不受傷的（invulnerable）、陽剛氣概的人才具有公民資格。

程的關係，就不可忽略熱線與新聞媒體的關係，以及熱線的媒體策略。

熱線與新聞媒體的頻繁互動，是它相較於其他同志團體的特色之一。新聞媒體對於熱線的重要性有以下三點：（一）民眾對於同志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主要來自於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想要扭轉這些偏見與刻板印象，也必須從源頭開始做起。（二）熱線所提供的相關服務，希望讓更多弱勢同志使用，但是這些人通常不會接觸同志社群，因此不能透過原有信息網路，而必須運用大眾媒體進行宣傳。（三）新聞媒體的曝光率增加，可以提高熱線知名度，有助於日後資源募集與工作推展。熱線積極與新聞媒體互動，除了成立時即發布新聞稿之外，還包括舉辦活動記者會、年度例行記者會、投書民意論壇、爭取報紙專欄版面、接受媒體採訪、舉辦「同運與媒體充電營」、撰寫論文分析相關報導等活動。

熱線因為同志議題具有新聞性、位於台灣媒體中心台北市、積極與新聞媒體互動，使得熱線相較於其他弱勢族群、台北市以外同志團體、乃至於台北市其他同志團體曝光率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機構化使得熱線具有某種程度的發言正當性，同志新聞發生時媒體記者會主動採訪熱線，而且晶晶書庫負責人阿哲與同志導演陳俊志，有時也會主動將媒體記者轉介給熱線，因為他們認為某些議題由熱線回答更適當。不過，曝光率高並不代表對於大眾影響力大，她們如果因為對於同志議題沒有興趣或反感，直接跳過相關報導省略不讀的話，這些報導對於她們就沒有辦法產生直接影響。因此，熱線的媒體策略應該不只是爭取盡可能多的正面同志新聞，而是應該進一步思考什麼樣的新聞訴求才能吸引閱聽人的注意力，進而引發她們閱讀反省並促使觀念改變。

熱線經由積極與新聞媒體互動，逐漸建立與友善記者的合作關

係，經由她們的協助，使得更多正面同志新聞可以出現於新聞媒體上。此外，因為熱線與友善記者建立合作關係，許多同志團體舉辦活動需要發新聞稿時，都會要求熱線提供友善記者名單，而友善記者要採訪某些同志活動時，也會透過熱線聯繫主辦的同志團體。換句話說，熱線已逐漸成為友善記者與其他同志團體之間的媒介。不過，熱線與新聞媒體的關係還是具有以下三點限制：（一）熱線因為受限於可以現身的成員很少，因此大部分新聞稿只針對報紙新聞記者發布，所以與電視新聞記者的關係比較薄弱。（二）熱線與報紙各線記者的關係深淺不一，除了與社團線記者維持穩定頻繁的互動之外，也因為歷屆台北同玩節與市政線記者有比較多的接觸之外，與政治線、社會線和醫藥線記者的關係則有待加強。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版與醫藥版出現的同志議題新聞，大部分還是以負面報導為主（吳翠松，1998）。因此，熱線與這兩線記者建立合作關係，就格外具有重要意義。（三）熱線與新聞媒體的關係會隨著人事變動而改變，新聞媒體是個變遷快速的行業，記者時常會面臨離職或換線的問題，熱線與新跑線的記者就必須重新建立關係。

六、熱線與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的關係

討論熱線與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的關係，主要是從台灣資本主義發展、都市化程度提高、以及華人傳統文化與文化全球化的影響。

熱線與經濟變遷的關係，主要是從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來討論。D'Emilio 的研究發現，美國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奠基於工資的勞動制度，提供個人相對於家庭的某些自主性，進而使得同志認同與社群的發展成為可能（D'Emilio, 1993）。在台灣同志與家庭的關

係，除了經濟生產關係之外，還有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家族主義（周華山，1997）。因此，「在台灣於家庭領域外自主的勞動力之發展，提供同志部分經濟自主，而沒有提供從家庭責任解脫的文化自主」（Naguyet Erni & Spires, 2001）。不過，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它與其他國家產生更密切的接觸，引發台灣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互動的過程，導致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對於同志議題的論述，持續影響台灣社會的看法。這個議題將於文化變遷部分進行更深入的討論。⁵

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對於同志社群與認同的影響，可以從消費文化這個角度來思考。「同志社群或對於它的信念，是透過參與同志機構（institution）來建立……注意所有這些參與構成或暗示某種形式的消費，各個參與覆疊（imbricated）於消費文化中（Chasin, 2000）。」台灣同志社群對於同志機構的參與，很重要的是透過消費同志商業機構所提供的相關商品，例如同志酒吧、三溫暖、書店、餐廳、網站等，這些同志機構是同志社群很重要的組成元素，人們藉由參與這些同志機構來建立認同，而台灣整體經濟情勢與個人可處分所得，都會影響人們對於它們的參與。此外，近年來台灣經濟不景氣，已經影響到熱線兩個經費來源，也就是政府與聯合勸募。如果經濟情勢持續惡化，進而影響熱線最主要的募款來源，也就是同志社群的話，熱線將面臨非常艱鉅的挑戰。最後，台灣經濟持續不景氣，影響新政府政治議題的優先順序，經濟議題的優先順位提高，相對壓縮人權議題的空間，進而縮小熱線所面臨的政治機會。目前新政府不斷宣示「全力拚經濟」，各政黨紛紛提出挽救經濟方案，而社會則瀰漫著對於失業與

5 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否導致（廣義與狹義）性的商品化，使得社會將性的主要意義不再視為生殖，進而提高對於同志的接受程度，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新貧階級」的焦慮，人權議題不再是各界的關注焦點。陳水扁總統就職時所提出的人權政策乏人問津，與同志權益密切相關的「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與「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⁶等立法工作則停滯不前。

熱線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主要是從台灣都市化程度提高，且集中於幾個主要都市的情形，特別是熱線位於台北市所受到的影響來討論。國外研究發現各國同志社群與同運的發展，大部分集中於幾個主要都市之中，其重要原因有以下三點：（一）主要都市居民人數眾多，而且同志有向主要都市遷移的傾向，使得當地同志較其他地區人數較多且密度較高，可能參與同志社群與同運的潛在成員較多。（二）主要都市的生活匿名性高與居民對於差異接受度高，提供同志社群與同運較大的發展空間。（三）主要都市擁有大部分的資源（無論同志社群內外），有利於同志社群與同運的發展（Bailey, 1999; Haeberle, 1996; Vega, Steger, & Bretting, 2001; Button, Rienzo, and Wald, 1997; Wilson, 1995）。回顧台灣同志社群的發展，同樣集中於台北市、高雄市、與台中市這幾個主要都市之中，而主要都市同志社群的發展，則會造成鄰近都市同志社群發展的限制，例如台北市同志社群的發展，會限制鄰近台北縣與基隆市同志社群的發展。

運用第二節所提出的分析架構可知，熱線位於全國首善之區台北市，具有相當優渥的條件從事同運。就政治機會而言，台北市作為中央政府所在地，熱線可以直接與中央政府互動，進而與其合作或獲得

6 「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由教育部委託專家學者研擬，內容規定學校應尊重學生及教職員工之性傾向，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傾向歧視，不得因學生之性傾向而給予歧視待遇等。

補助。此外，台北市政府自許為國際化都市，對於同志議題接受程度更高。就動員結構而言，台北市同志社群發展最蓬勃，可以提供熱線發展所需的資源。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台灣大專院校同志社團，占有同志社團很大的比例，而台北市因為大專院校集中，所以擁有最多的同志校園社團，這些社團提供熱線發展所需的許多資源。運用 McCarthy 的分析可知，同志校園社團為同運動員結構的一部分，其性質依不同社團可以區分為非運動或介於運動與非運動之間，以及非正式或介於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熱線許多義工與經費（特別是募款晚會票款）都來自於同志校園社團（McCarthy, 1996）。就詮釋架構而言，台北市是全國媒體中心，熱線透過與各大媒體記者的頻繁互動，而掌握相關議題更多發言權。就經濟／社會／文化變遷而言，台北市生活匿名性高，以及居民對於差異接受度高，提供熱線較大的發展空間。就與其他社運團體的關係而言，台北市是許多重要社運團體的所在地，熱線藉由與這些團體合作，進而擁有更多能力與影響力。

熱線與文化變遷的關係，主要是從以下三個因素來討論：（一）華人傳統文化對於同性親密關係的看法。（二）文化全球化對於台灣文化的影響。（三）社運與同運對於台灣文化的影響。

華人傳統文化對於同性親密關係的看法，依照小明雄的看法是所謂「隱蔽式反同性愛心理」，並不像西方某些宗教所認為，是一件罪大惡極的事。甚至一個男人如果結婚生子，盡他應盡的家族責任，那麼他與其他女人或男人所發展的性愛關係，是可以被接受或容忍的（小明雄，1984）。換個角度來看，在台灣同志被邊緣化，主要是因為她們偏離受儒家主義影響，（異性戀規範）以家庭中心的傳統社會秩序（Naguyet Erni & Spires, 2001）。此外，台灣主要宗教教義並沒有明顯反對同志，所以同運發展所遇到的阻礙比較小（例如台灣自始

即沒有懲罰同性性行為的法律），也比較容易轉變民眾的負面態度。

不過，台灣近年來對於同志議題的看法經歷很大轉變，應該從台灣解除戒嚴之後，政府放寬對於大眾傳媒的管制，進而加速文化全球化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國際企業精英文化、全球通俗文化、全球學術精英文化、通俗宗教文化等四種全球化力量，從八十年代開始，就在台灣普遍出現，引發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互動（蕭新煌，2002）。在這個過程中，台灣對於同志議題的看法，經歷污名化與反污名化的影響，早期污名化的影響遠大於反污名化的影響，晚近污名化與反污名化的影響互有優劣，大眾傳媒則扮演舉足輕重的傳播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污名化或反污名化的論述，例如台灣某些福音派新教會視同志是罪、大眾媒體將愛滋與同志畫上等號、以及同運爭取平權所運用的策略與訴求等，同樣受到美國相關論述很大影響。

最後，台灣近年來對於某些議題的看法經歷很大轉變，也會間接影響對於同志議題的看法，例如性別角色、基本人權、弱勢族群、性道德等。這些看法之所以會出現轉變，國內外其他社會運動的努力，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此外，可以將台灣同運視為「文化形貌轉換的企圖」，也就是針對大眾傳播媒體、組織和大眾文化、微觀和個人的認知等，進行轉換的企圖（王雅各，1999）。筆者觀察發覺同運近年來的努力，的確對於這些面向產生正面影響。台灣同運運用媒體策略取得發言權，增加報紙對於同志議題新聞的正面報導，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吳翠松，1998）。



七、熱線與其他社運團體的關係

熱線與其他社運團體的關係，包含以下三個面向：熱線與其他同志團體、其他社運團體、以及反同運團體之間，相互學習、合作、影響、資源共享、競爭、對抗等互動關係。

熱線與其他同志團體的關係，會受到以下四個因素影響：地理距離、合作經驗、人際關係、與理念差距。換句話說，地理距離近、合作經驗多、人際關係緊密、理念相近，使得熱線與某些同志團體關係密切；相反的，地理距離遠、合作經驗少、人際關係疏遠、理念差異，造成熱線與其他同志團體關係薄弱。

就合作經驗而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歷經人權聯盟、歷屆同玩節、與同志觀察團的經驗，逐漸產生以熱線作為樞紐，結合其他同志團體，共同推動同運的合作模式。以下將以第二屆同玩節為例，以進行更詳細的說明。熱線是台北市各同志團體中唯一正式立案，也因此具有資格承辦同玩節；此外，熱線具有第一屆同玩節與台北市民政局和市政線記者的合作經驗，以及擁有自己的辦公室與專職工作人員，在這種條件之下，使得它成為第二屆同玩節的承辦團體。不過，許多同志團體認為同玩節是屬於整個同志社群的節慶，而且熱線認為其規模過大無法獨自籌畫執行。因此，延續第一屆台北同玩節的合作模式，由熱線邀集台北大部分同志團體開會，共同討論同玩節的活動主題與內容形式，並將整個活動分成幾個部分，各找一個主要負責的同志團體，再由其他同志團體從旁協助，而熱線則從中扮演統籌角色。這次經驗除了建立熱線與其他同志團體日後的合作模式之外，同時使得各同志團體彼此之間，特別是女同志團體與男同志團體之間，開始有相互接觸與合作的機會，這也是同玩節最重要的意義之一。

就人際關係而言。首先，熱線與其他同志團體成員之間有重疊的情形，有助於熱線與其他同志團體的關係。例如熱線與性別人權協會和教師同盟就是如此，因此具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其次，熱線與其他同志團體成員之間原有的人際關係，對於彼此關係所造成的機會與限制。例如熱線公關主要負責人是秘書長，第一、二屆秘書長是男同志，因為他出身男同志學生社團，與許多男同志社團關係密切，再加上曾舉辦愛滋防治巡迴講座，因此使得熱線與這些社團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相對而言，熱線與女同志學生社團的關係，除了與台大女同志文化研究社較為緊密之外，一般來說皆較為疏遠。不過，熱線與大部分女同志校園團體還是有許多合作，這包括熱線協助「校園同志甦醒日」（GLAD）的籌辦、許多女同志校園團體參與「台北同玩節」、以及「北部大專院校女同志社團聯盟」（NULA）定期於熱線開會等。

就理念差距而言，熱線與某些同志團體的理念差異，會影響熱線跟這些團體合作意願，進而影響熱線與它們的關係。例如熱線與台灣同志人權協會（簡稱人權協會），針對同志參選立委這個議題具有不同看法。熱線認為同志社群政治覺醒的工作才剛起步，所謂的「同志選票」尚未形成，現階段並不是同志參選立委的成熟時機，倒不如積極爭取友善政治人物對於同志權益的支持。因此，針對這個議題兩個團體並沒有合作，進而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此外，針對華人同志交流大會的理念差異，也影響兩個團體的合作關係。

熱線與其他社運團體的關係，除了前述地理距離、合作經驗、人際關係、理念差距等因素之外，還受到合作意願的影響。首先，熱線規劃工作項目為同志平權運動、性別平等教育、與愛滋防治工作，使得與人權、婦女、愛滋團體的議題距離較近，增加與這些團體合作的可能性。其次，因為熱線與其他社運團體資源相當有限，要從事這些

工作必須彼此進行合作。最後，值得注意的是，社運團體在各種策略、戰術、目標、組織形式、商議風格（deliberative style）之中做選擇時，是否符合自身認同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Polletta & Jasper, 2001）。台灣某些基督教團體參與愛滋防治工作，在現階段她們的基督教認同，以及對於同志議題的看法，並不允許她們與熱線針對男同志安全性行為進行合作。

熱線與婦女團體的關係，主要是指與婦女新知基金會（簡稱婦女新知）的關係。當初熱線電話諮詢服務的設計，即部分受到婦女新知民法諮詢熱線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熱線從它推動兩性平等教育的經驗中，認識到社運從事教育改革的重要性，進而致力於性別平等教育。此外，婦女新知與其他團體推動兩性平等教育的努力，也使得教育部與各級學校對於同志議題的接受程度提高。同時，熱線與婦女新知於性別平等教育上，也開始有相互合作與資源連結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婦女新知相較於熱線是資源較多的團體，前任董事長蘇芊玲與工作人員，會很主動地將某些資源轉介給熱線。而最近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成立，也成為熱線於性別平等教育上很重要的結盟對象。

熱線與愛滋團體的關係，主要是指與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簡稱權促會）及生命社福協會（簡稱生命社福）的關係。熱線與這兩個團體的關係，起源於針對全國男同志校園團體，共同舉辦愛滋防治巡迴講座。當初，這三個團體都希望降低男同志學生愛滋感染者的人數，但是熱線缺乏愛滋相關工作的實務經驗，而權促會與生命社福則缺乏對於男同志校園團體的認識與關係，雙方合作才使得巡迴講座成為可能。最後，熱線從這次合作經驗中，除了建立與這兩個團體的關係之外，還跟權促會學習向疾管局申請經費的經驗。更重要的是，熱線逐漸釐清於愛滋防治工作的立場，也就是認為教育宣導重於愛滋節

檢，以及與其他愛滋團體的合作模式，也就是熱線擁有對於男同志社群的認識與關係，其他愛滋團體擁有愛滋相關工作的實務經驗，共同合作針對男同志社群進行愛滋防治的教育宣導工作。

熱線與人權團體的關係，主要是指與台灣人權促進會（簡稱台權會）的關係。首先，台權會前會長邱晃泉律師擔任熱線法律顧問，以解決同志侵權案件相關法律問題。同時，他也是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成員，熱線透過他了解政府相關政策的制定過程，並傳達同志團體的意見。此外，台權會身為主流人權團體之一，其連署與聲援增加熱線訴求的正當性，而熱線與台權會也針對許多人權議題進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台權會與熱線接觸之後，開始仿效熱線的義工培訓制度，也就是以培訓課程來訓練義工，以期她們日後投入機構工作，這是台灣同運影響其他社運的實例之一。不過，熱線的義工培訓制度，具有讓義工參與同志社群與建立自我認同的意義，而台權會的義工培訓制度就較少具有這層意義。這反映出同運與人權運動的某些差異，也顯示同樣制度在不同社運中，可能具有不同意義。

熱線與反同運團體的關係，主要是指與某些保守基督教和天主教會的關係。在台灣各宗教對於同志議題看法不一，佛教與道教的教義並沒有明顯反對同志，而某些保守的基督教、天主教與回教教會，則認為同志是罪需要悔改，但是因為在台灣回教信徒人數過少，不足以構成反同運的勢力，因此某些保守基督教與天主教會，是台灣目前少數公開反對同運的組織性力量。可是，也因為它們於台灣信徒人數不多，使得台灣反同運團體的勢力薄弱。熱線與這些保守基督教和天主教會的關係，除了針對第一屆同玩節直接進行政治角力之外，熱線並主動與態度中立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話，進而爭取其對於同志議題的支持。不過，熱線與反同運團體的關係並不密切，這

反映出反同運團體勢力的薄弱，對於台灣同運乃至於熱線的影響有限，並不是一個重要而必須處理的議題。同時，也反映出熱線資源人力有限，並無餘力從事與教會對話的工作。

八、結論

首先，這五組因素不是各自獨立，而是彼此之間具有複雜的互動關係，現在嘗試從以上分析做簡單歸納。就政治機會而言。政府對於同志權益的侵害，提供同運動員的機會，而政治機會的開放，也會增加熱線的經費來源。此外，政府某些作為賦予同志議題正當性，某些作為卻又加以污名化，這些都會影響詮釋架構過程，而熱線與政府的論辯，本身就是詮釋架構過程的一部分。就動員結構而言。動員結構直接影響熱線所擁有的資源，進而影響熱線對於其他因素所產生機會與限制的因應，以及影響熱線改變其他因素的能力。此外，本文比較少討論到的是，熱線可能因為競爭有限資源，而影響到與其他同志團體的關係。不過，熱線可藉由增加同志社群的認同（激發它提供資源的意願），以及與其他同志團體進行議題區分等方式，來避免這種情形的發生。就詮釋架構過程而言。熱線與許多對象的論辯過程，就短期而言會改變民意與政治菁英對於同志議題的態度，進而影響政治機會；就長期而言會轉化文化蓄積而導致文化變遷。此外，詮釋架構（包括認同）的相似或互斥，也會影響熱線與其他社運團體的關係。就經濟／社會／文化變遷而言。首先，這些因素的變遷會影響其他社運的發展，進而直接或間接影響熱線的發展。其次，經濟變遷會影響熱線所面臨的動員結構，以及政治議題的優先順序。最後，文化變遷會影響同運所面臨的政治機會、動員結構、詮釋架構過程、與其他社運團

體的關係。就與其他社運團體的關係而言。首先，熱線與其他社運團體的合作，有助於政治機會的開放。其次，熱線與其他社運團體的合作，會擴大它所面臨的動員結構。最後，其他社運團體的發展，提供動員結構與論述架構讓熱線學習，並轉化文化蓄積而導致文化變遷。

其次，熱線的機構化使得同志運動者的集結，不會因為某些事件落幕而解散，而是可以持續規劃推動相關工作。此外，機構化也在上述五組因素中，對於熱線運作與發展造成影響。就政治機會而言，機構化使得熱線擁有更多的戰術戲碼，不但可以採取體制外抗爭，還可以運用體制內陳情的方式。就動員結構而言，機構化除了使得熱線經費來源多元化，熱線進而藉由與政府和聯合勸募的合作，使得訴求更體制化與運作更制度化，但是機構化也對於熱線的決策模式與義工角色產生改變。就詮釋架構過程而言，機構化使得熱線擁有某種程度的發言正當性，使得熱線的媒體曝光率更高，並且強化熱線與新聞媒體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熱線機構化發展並不是必然的，內部對於是否進一步機構化仍有爭議，即使後來選擇進一步機構化，熱線仍將面臨許多挑戰，包括理監事會功能的健全、動員結構的多元化與鞏固、組織運作的制度化、以及增加義工的參與和投入等。熱線是第一個嘗試機構化的同運團體，使得上述這些挑戰更形嚴峻。

最後，本文對於熱線未來的發展，有以下幾點建議。熱線必須先確定日後發展方向，熱線這幾年來不斷發展工作項目，卻很少回顧過去工作成果，釐清各項工作的意義與得失，進而藉由組織內部廣泛討論，規劃未來各階段目標，進而訂定工作計劃加以執行。使得很多工作都屬於被動回應的性質，比較缺乏長期規劃與持續推動的計畫。熱線應提供更多機會讓義工們進行討論與表達意見，理監事會在這方面的功能也應加強。

接著應評估達成目標所需的資源，這包括人力資源、物質資源、與公關資源。就人力資源的部分，必須由專人負責人力資源的評估、招募、培訓、工作分配、情感聯繫、在職訓練、個督、團督等工作。熱線目前定期招募培訓的義工只有諮詢義工而已，這是其他工作人力長期不足的制度性因素，解決之道必須從定期招募培訓其他工作人力做起。此外，如何鼓勵義工參與熱線各項工作，從籌畫與執行的過程中，培養能力與激發興趣，進而在生命中長出行動的力量，則是更重要的工作。就物質資源的部分，必須由專人負責物質資源的評估、規劃募款計劃、撰寫企劃書、編列財務報表、核銷、報稅、常態費用的支付等工作。此外，理監事們必須負起更多的募款責任，減輕工作人員這方面的負擔。就公關資源的部分，必須由專人負責公關資源的評估，並且建立與同志社群、相關政府機構、友善政治菁英、友善記者、其他社運團體的關係，藉由相互合作與資源共享，以增加熱線的能力與影響力。這些工作對於熱線長期發展是必要的，必須增加專職工作人員，並且進行更明確的分工，以健全機構體質與運作制度化。

此外，應讓邊緣同志的主體性出現，熱線目前連女同志的主體性都有待加強，更不用說像是原住民同志、殘障同志、勞工同志、老年同志等的主體性。雖然熱線自從成立以來，非常關注青少年／年同志的議題，可是她們的主體性也同樣沒有於熱線出現。熱線最近從事愛滋防治工作，藉此接觸到只出入三溫暖、公園的男同志社群，是它服務對象多元化的開始。不過，更根本的做法應從招募邊緣同志著手，進而讓她們參與決策機制，進而使得她們的主體性，出現於服務對象、活動類型、倡導議題、文宣內容等熱線運作的各個層面。

最後，熱線必須清楚認識到，同運只有熱線與少數同志團體投入是不夠的，必須讓更多同志團體成立並且致力於相關工作，而且它們

的發展不能侷限於台北市。除了熱線將某些工作項目，擴展到台北市以外的地區，全國各地如何突破資源限制，成立同志團體並投入在地同運是必要的。因此，熱線如何協助其他同志團體的發展，以厚植台灣同運的基礎，是必須思考的重要議題。

◎作者簡介：

賴鈺麟，同志諮詢熱線組織部主任，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研究興趣是同志運動、同志人權處境、同志人權法制化等議題，論文相繼於國內性別議題研討會發表，希望前往美國攻讀社會學博士，主修社會運動。參與同運已經四年，期許自己繼續堅持下去。

〈聯絡方式〉

地址：100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七十號十二樓，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電話：02-23921969

E-mail：poki@mail.moe.gov.tw



參考文獻

- 1998 選舉同志人權聯盟(1998)《台北彩虹新世紀——台北市同志族群的願景》，未出版資料。
- 2001 立委選舉同志觀察團(2001)《致台北縣市各立委候選人》，未出版資料。
- 小明雄(1984)《中國同性愛史錄》。香港：粉紅三角。
- 王雅各(1999)《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台北：開心陽光。
- 王蘋(2002)〈同志人權登上國家檯面〉，李茂生編《2001年台灣人權報告》，203-210。台北：前衛。
- 汪明輝(2003)〈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回顧與展望〉，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95-135。台北：新自然主義。
- 周華山(1997)《後殖民同志》。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 吳翠松(1998)《報紙中的同志——十五年來同性戀議題報導的解析》。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喀飛(2002)〈從「墜樓事件」新聞中看媒體對同志的報導態度〉，謝臥龍編《性別：解讀與跨越》，129-143。台北：五南。
- 賴鈺麟(2000)〈同志運動與社會運動理論的辯證關係〉論文發表於「第五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2002)《台灣同志運動與同志諮詢熱線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新煌(2002)〈共享與融合——當代台灣的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Samuel P. Huntington、Peter L. Berger編《杭廷頓&柏格看全球化大趨勢》(王伯鴻譯)，38-57。台北：時報文化。

顧忠華 (2003) 〈社會運動的「機構化」：兼論非營利組織在公民社會中的角色〉，張茂桂、鄭永年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1-28。台北：新自然主義。

Bailey, R. W. (1999) *Gay politics, urban politics: Identity and economics in the urban sett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enford, R. D. & Snow, D. A.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Button, J. W, Rienzo, B. A. & Wald, K. D. (1997) *Private lives, public conflicts: Battles over gay rights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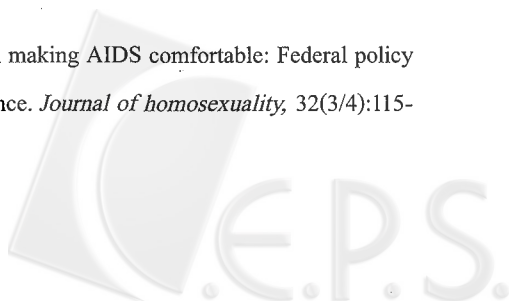
Chasin, A. (2000) *Selling out: The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goes to marke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ostain, A. N. & Majstorovic, S. (1994) Congress, social movements and public opinion: Multiple origins of women's right legisl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7(1): 111-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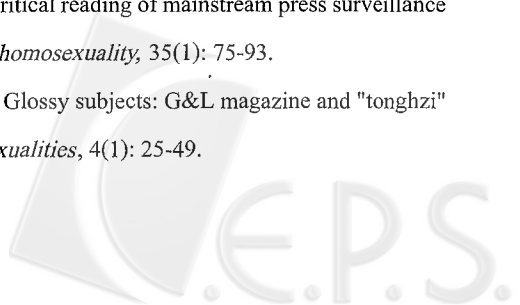
Della Porta, D. & Diani, M. (1999)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中譯本，苗延威譯(2002)《社會運動概論》。台北：巨流。

D'Emilio, J. (1993) 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 In H. Abelove, M. A. Barale, & D. M. Halperin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pp. 467-476). New York: Routledge.

Donovan, M. C. (1997) The problem with making AIDS comfortable: Federal policy making and the rhetoric of innocenc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2(3/4):115-144.



- Epstein, S. (1988) Moral contagion and the medicalizing of gay identity: AI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esearch in law,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9:3-36.
- Frank, D. J. & McEneaney, E. H. (1999)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state policies on same-sex sexual relations, 1984-1995. *Social forces*, 77(3): 911-944.
- Haeberle, S. H. (1996) Gay men and lesbian at city hall.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7(1): 190-197.
- Hertzog, M. (1996) *The lavender vote: Lesbians, gay men, and bisexuals in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 (1996)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D. McAdam, J. D. McCarthy, & M.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p. 23-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96) Introduction: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framing processes- toward a synthe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In D. McAdam, J. D. McCarthy, & M.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p. 1-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 D. (1996)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adopting, adapting, and inventing. In D. McAdam, J. D. McCarthy, & M.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p. 141-1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yrick, R. (1998) AIDS discourse: A critical reading of mainstream press surveillance of marginal ident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5(1): 75-93.
- Naguyet Erni, J. & Spires, A. J. (2001) Glossy subjects: G&L magazine and "tonghzi" cultural visibility in Taiwan. *Sexualities*, 4(1): 25-49.



- Omoto, A. M. & Snyder, M. (1993) AIDS volunteers and their motivations: Theoretical issues and practical concerns. *Nonprofit management & leadership*, 4(2): 157-176.
- (1995) Sustained helping without obligations: Motivation, longevity of service, and perceived attitude change among AIDS volunte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4): 671-686.
- Polletta, F. & Jasper, J. M. (2001)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283-305.
- Phelan, S. (2001) *Sexual strangers: Gays, lesbians, and dilemmas of citizenship*.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Ramirez-Valles, J. & Brown, A. U. (2003) Latino's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HIV/AIDS: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on volunteering. *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15(supplement a): 90-104.
- Simon, B., Sturmer, S., Leowy, M., Weber, U., Freytag, P., Habig, C., Kampmeier, C., & Spahlinger, P. (1998)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3): 646-658.
- Simon, B., Sturmer, S., & Steffens, K. (2000) Helping individuals or group members? The role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in AIDS volunteer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6(4): 497-506.
- Snow, D. A. & Benford, R. 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97-218, as cited in Benford, R. D. & Snow, D. A.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Vega, A., Steger, D., & Bretting, J. G. (2001) Does urban context matter? Social diversity influences on attitudes and perceptions toward gay and lesbian politics

in San Antonio, Texas. *Q: Journal of sexual orientation & public policy*, 1(1): 1-24.

Waldijk, K. (2000) Civil developments: Patterns of reform in the legal position of same-sex partners in Europe. *Canadian journal of family law*, 17(1): 62-88.

Wilson, T. C. (1995) Urbanism and unconventionality: The case of sexual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6(2): 346-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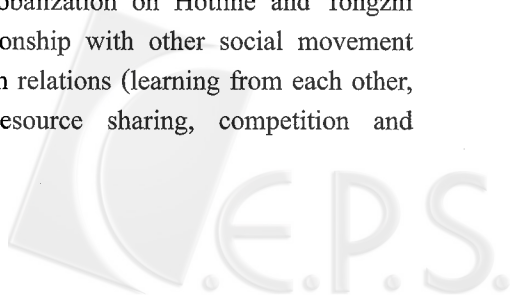
Zald, M. N. (1996) Culture, ideology, and strategic framing. In D. McAdam, J. D. McCarthy, & M.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p. 261-2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aiwan Tongzhi Movement: A Case Study of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Yu-lin Lai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recent years, Tongzhi movements in Taiwan have become more institutionalized than ever. I choose Hotline as the subject of my research to gain more insight into this development. To begin with, I revise the analyt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movements proposed by McAdam and other scholars and come up with the analytical structure of Tongzhi movements. I use this structure to discuss how Hotline runs and develops. Secondly, I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In terms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brought by the violation of gay rights by the government, other Tongzhi-related policies, and the elections. In terms of mobilizing structures, I probe into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people's intention to be volunteers and their dedication to Hotline, what kinds of soci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do Hotline use to mobilize and run, and the reasons why the sources of the funds diversify. In terms of framing processes, I discuss the targets of debates with which Hotline produces the frame, the media strategy with which the frame is distribu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mass media. In terms of economic/social/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 survey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ism, urbaniz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on Hotline and Tongzhi movement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 study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cooperation, mutual influence, resource sharing,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with other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Lastly, I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five factors and bring about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oper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tline.

Keywords : Tongzhi movement, institutionlization,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framing processes and economic/ social/cultural transformation.

